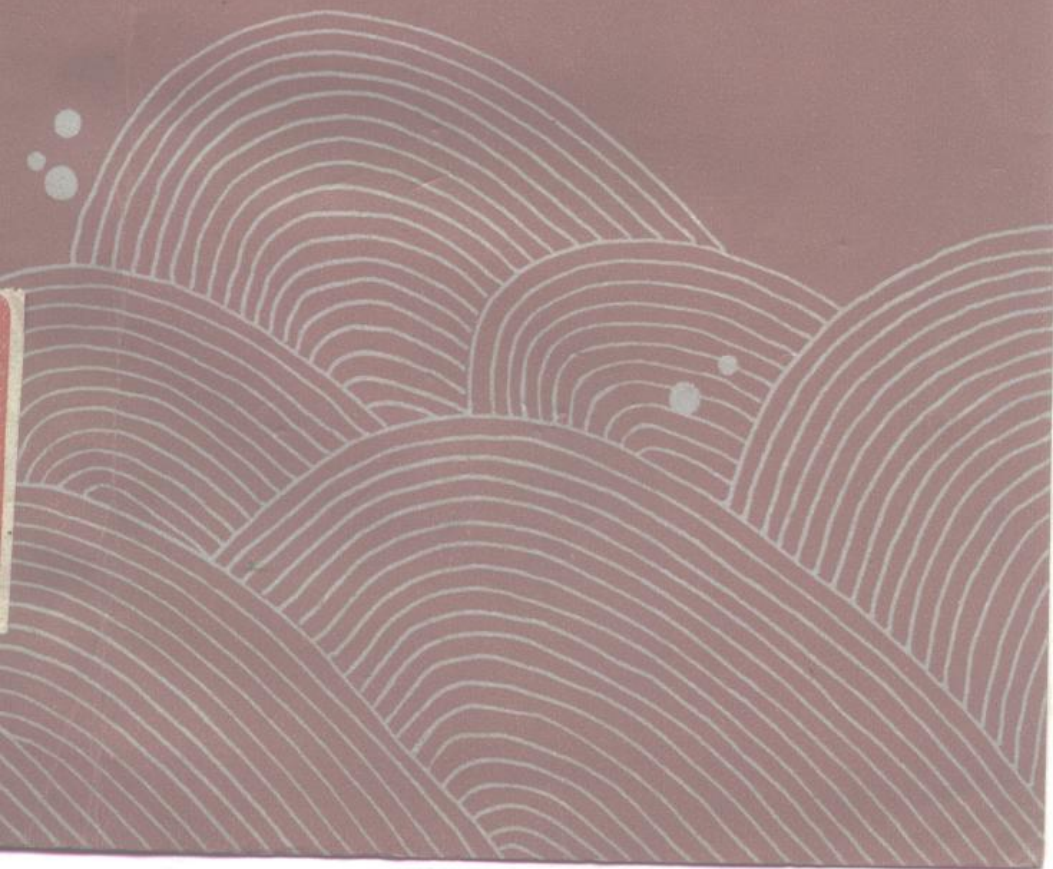


中國文學

(當代部分)

洪子誠 李 平 編著



中 国 文 学

四

(当代部分)

洪子诚 李 平 编著

责任编辑：梁惠陵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1201 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40千字

1986年11月第一版 198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97,000册

统一书号：10209·120 定价：1.64元

前 言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中国新文学，走过了三十年的道路，到了四十年代末期，由于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而进入它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开端，以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为标志。目前，人们习惯上把我国“五四”到建国前的文学称为“现代文学”，而把建国以后的文学称为“当代文学”。近四十年来，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道路是崎岖曲折的。它取得不小的成绩，但也存在严重的失误和问题；而当代文学的各个不同时期，在情况上又有很大的差异。回顾我国文学走过的这一段路程，充分认识文学事业的成绩和不足，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探索当代文学发展的规律，以促进我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是我们学习当代文学的基本目的。

对于近四十年来的我国当代文学，按照文学发展的特点，可以划分为三个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时期。第一个时期，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十七年文学”。第二个时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十年。1976年底粉碎“四人帮”之后，尤其是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代文学出现了新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这是当代文学的第三个时期，可以称为“新时期文学”。

1966年5月至1976年9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学事业与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一样，遭到严重破坏，遭到历史上罕见的深重劫难。在文艺界，大批作家、艺术家被诬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和“文艺黑线人物”而

受到打击和迫害，被剥夺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被全盘否定，几乎所有的中外优秀文学作品被禁绝。所有文学刊物都被迫停刊。直到1972年文学创作才有所恢复，出现了极少量的文学刊物和文学作品。在这动荡的十年中，虽然也有个别较好的作品问世，但绝大多数的创作，或者自觉服务于某一政治阴谋，或者用来阐释错误的政治路线，或者遵循“三突出”等强制推行的创作模式，而缺乏艺术上的价值。因此，本书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将不作具体评述分析，而把重点放在“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上面。这样的处理，并非说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在我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可以略去不论，相反，这个时期的情况，它的历史经验，都是十分重要，需要认真加以清理和总结的。

本书从教学的实际需要出发，以对重点作家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的分析作为主要内容。在分析重点作品的同时，对作家的创作道路，以及他的其它重要作品，也做些简要的介绍，以期有较全面的了解。作家、作品的选定，以思想、艺术质量为主要标准，但也兼顾到作家、作品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曾经产生的影响。虽然本书以作家作品的分析为主，但是，对于文学历史发展的脉络、线索，对于每一文学时期的概貌和特征，也做些轮廓性的描述。因此，每一编都有“概述”的专章，每一种文学体裁之后也有适当的文字，以加强这方面的内容。这样，就为所论及的作家、作品的具体历史位置，和它们出现时的文学背景，做了必要的说明。

本书下编第三章散文和报告文学创作，由李平执笔。其它部分，洪子诚执笔。

洪子诚

1986年6月

目 录

上编 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

第一章 概 述	(1)
第二章 诗歌创作	(10)
第一节 闻捷的诗	(14)
第二节 李瑛的诗	(21)
第三节 贺敬之的诗	(28)
第四节 郭小川的诗	(36)
第三章 散文和报告文学创作	(45)
第一节 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	(50)
第二节 刘白羽的《长江三日》	(54)
第三节 秦牧的《土地》	(59)
第四节 杨朔的《荔枝蜜》	(66)
第五节 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	(74)
第四章 戏剧创作	(82)
第一节 老舍的《茶馆》	(86)
第二节 田汉的《关汉卿》	(94)
第五章 中短篇小说创作	(103)

第一节	赵树理的《登记》	(108)
第二节	孙犁的《山地回忆》	(115)
第三节	茹志鹃的《百合花》	(122)
第四节	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	(130)
第六章	长篇小说创作	(139)
第一节	梁斌的《红旗谱》	(143)
第二节	杨沫的《青春之歌》	(151)
第三节	柳青的《创业史》	(157)

下编 新时期的文学

第一章	概 述	(165)
第二章	诗歌创作	(173)
第一节	艾青的诗	(177)
第二节	公刘的诗	(184)
第三节	诗坛新人的创作	(191)
第三章	散文和报告文学创作	(208)
第一节	巴金和黄秋耘的散文	(210)
第二节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	(218)
第三节	理由的《扬眉剑出鞘》	(226)
第四节	黄宗英的《大雁情》	(233)
第四章	戏剧创作	(241)
第一节	沙叶新的《陈毅市长》	(245)
第二节	高行健的《绝对信号》	(251)
第五章	短篇小说创作	(257)
第一节	王蒙的《春之声》	(263)

第二节	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	(271)
第三节	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	(278)
第四节	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	(287)
第五节	徐怀中的《西线无战事》	(294)
第六章	中、长篇小说创作	(301)
第一节	陆文夫的《美食家》	(301)
第二节	张贤亮的《河的子孙》	(308)
第三节	张承志的《黑骏马》	(316)
第四节	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323)
第五节	古华的《芙蓉镇》	(329)

上编 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

第一章 概 述

我国当代文学的第一个时期，即“十七年文学”（1949—1965），存在着比较复杂的情况。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可以做这样的概括：有发展，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也有不少的问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十七年的时间并不长，但发展道路却表现了明显的起伏和曲折。下面，从四个方面，对“十七年文学”的概貌，做简略的描述。

第一，作家队伍的情况。十七年中，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主要由两部分作家构成。一是建国以前就投身于文学事业、并已取得一定成绩的作家。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使来自国统区和来自解放区的两支文艺队伍会合在一起。他们之中，既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拓文学新路的前辈，也有在三、四十年代陆续开始文学生涯的作家。来自国统区的作家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沈从文、张天翼、臧克家、叶圣陶、胡风、田汉、夏衍、艾芜、冯至、袁水拍等，老舍、冰心、卞之琳、李健吾也在建国初期从国外归来。从解放区来的作家，主要有丁玲、艾青、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孙犁、田间、欧阳山、李季、柳青、贺敬之、刘白羽、张志民、马烽、胡可、柯仲平等。上述作家中的许多人，在解放后，怀着极

大的热情,努力、同时也是十分艰苦地为表现新生活进行探索。这涉及创作的取材、主题、人物形象、情感内容和艺术方法等一系列问题。不仅来自国统区的作家是这样,就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也面临着这方面的问题,面临着适应与革新的艺术难关。社会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建国后在文艺思想、文艺方针上对文学配合、服务政治的功能的强调,表现工农兵的形象和生活做为文学创作压倒一切的任务的提出,这些,都与作家(尤其是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已形成的艺术个性产生距离和矛盾。围绕表现新的生活而改变自己艺术个性不协调部分,建立有新的时代特征的艺术风格,是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目标。但是,艺术创造包含着许多复杂的因素,由于客观环境的束缚,由于他们中一些人依据的指导思想并不都很正确,因而,他们的探索,有成绩,也有失败。有的作家建国以后就不再继续文学创作,有的尝试过一段时间而后辍笔,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家虽然写了不少作品,成绩却大大不如过去已达到的水平:郭沫若、巴金、曹禺、艾青、丁玲、张天翼、臧克家、田间、何其芳、沙汀、艾芜、夏衍、陈白尘、袁牧之,以及老舍的大部分创作,都说明了这一情况。

“十七年”创作队伍的另一部分作家,则是出现于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的文学新人。他们在一开始,虽然幼稚、不够成熟,但是与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密切联系,他们逐渐成为“十七年”文学创作的更为主要的力量。这部分作家也有不同的情况。有的在革命队伍中已有较长的生活经历,他们过去或主要从事实际工作,或虽也写过作品,但还没有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他们在生活和艺术上有较多的准备,一开始就取得比较突出的成绩。这些作家如杜鹏程、梁斌、杨沫、郭小川、闻捷、蔡其矫、杨朔、王汶石、秦牧、峻青、王愿坚、曲波、刘宾雁

等。更多的文学新人，崛起于新中国建立前后的历史时期，他们有王蒙、李准、茹志鹃、邓友梅、林斤澜、高晓声、陆文夫、刘绍棠、刘真、公刘、李瑛、邵燕祥、白桦等等。这些文学新人，他们或在历史暴风雨时代投身革命事业，或怀着对新中国的热烈感情走上生活道路。革命与文学，在他们的认识中是统一的：文学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达到革命目的的手段；作家，首先应该是个战士，是个革命者。这种在缔造新中国的革命年代确立的文学观念，决定了“十七年”文学强烈政治色彩和理想主义的性质。

第二，发展的基本脉络。在十七年中，文学的发展呈现起伏的，波浪形的轨迹。这一时期，对文学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政治、经济的因素，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文学思潮的因素。从总的情况看，十七年中，有两段时间文学发展比较快，成绩也比较突出，这就是五十年代前、中期和六十年代初。而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1963年以后展开的文化批判运动，都给文学事业带来极大的挫伤和破坏。

建国初年，文学创作情况并不理想，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作家在历史转折时期有一个必不可少的适应、摸索的过程。到了五十年代中期，情况有了明显变化，陆续出现一批有一定质量的作品。这种情况的产生，与当时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发展较快，人们对生活充满信心、有较自由舒畅的创作气氛有关。尤其是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使文学界出现活跃的创造、探索的局面。对我国革命文学运动的经验，对文学理论和文艺方针政策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文学与政治关系，“写真实”与“干预生活”的文学主张，典型问题，党对文艺领导等，展开热烈讨论。创作成果，则首先从短篇小说、报告文学上得到反映，诗、散文和戏剧创作，也开始出现新的

气象。何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巴人(王任叔)的《论人情》,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是当时出现的重要的理论文章。短篇小说、特写方面,出现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李国文的《改选》,刘绍棠的《田野落霞》、《西苑草》,耿龙祥的《入党》、《明镜台》,柯又化(秦兆阳)的《沉默》,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等作品,以及话剧《同甘共苦》(岳野)、《布谷鸟又叫了》(杨履方),诗歌《草木篇》(流沙河)、《贾桂香》(邵燕祥)、《在智利的海岬上》(艾青)、《致大海》、《一个和八个》(郭小川),杂文《况钟的笔》(巴人)、《“言论老生”》(唐弢)、《大象和大纲》(肖乾)、《犬儒的刺》(黄秋耘)、《论睁眼看世界》(严秀)、《“废名论”存疑》(任晦)……这些作品,显示了创作题材的不断扩大,对生活矛盾的揭示的深化,以及艺术方式、艺术手段上的对统一模式的突破和革新的发展趋势。但是,这一充满生命力的局面,未等有进一步发展,未等取得更重要成果,便因反右派斗争而夭折。接着的“大跃进”、“反右倾”运动,加重了这种破坏,使文学事业在虚假的“繁荣”现象下,出现事实上的衰败。当然,这个低潮时期,也出现一些好作品:这主要是经过较长时间孕育的长篇小说,以及历史题材的戏剧作品。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政治、经济上严重错误的恶果已充分暴露,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与对于农村工作和国民经济的旨在纠正错误所实行的调整方针相适应,文艺政策也开始调整,克服极左路线造成的危害。从1961到1962年,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总结、调整文艺政策。《文艺报》的《题材问题》专论(1963年第3期)的发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的召开(1961年6月);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的

举行(1962年3月);《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文艺八条》)的正式颁发(1962年5月);《人民日报》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发表(1962年5月23日);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大连会议”)的召开(1962年8月);以及报刊上对文学创作的题材问题、悲剧问题、历史剧问题、继承我国古代文学遗产问题的热烈讨论;……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创造一个让作家能发挥他们的才能、能心情舒畅进行艺术创造的环境,促进文学创作从狭窄、贫乏、单调走向宽广、丰富和多样。这种努力,在实际上也开始收到一定的效果:短篇小说和诗歌在遭受严重挫伤之后开始恢复,一批历史题材的话剧和戏曲的涌现,散文创作的繁荣和丰收,作家对提高作品艺术质量的重视,……但是,这一阶段与五十年代中期出现的局面同样短促,从1963年起,中国社会生活又被卷入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之中,而且文艺首先受到猛烈的冲击。

第三,文学创作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说“十七年文学”有发展,取得一定的成绩,当然主要要由创作实践来体现。十七年中,发表、出版了一批优秀的或比较好的作品。中、长篇小说有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孙犁的《铁木前传》、《风云初记》,赵树理的《三里湾》,吴强的《红日》,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梁斌的《红旗谱》,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欧阳山的《三家巷》,李劫人的《大波》,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等。这个时期,有一批作家在短篇小说这一领域上耕耘,取得可喜的成绩,他们有赵树理、孙犁、王汶石、李准、周立波、茹志鹃、马烽、西戎、峻青、王愿坚。艾青、郭小川、贺敬之、闻捷、公刘、李瑛、李季的诗,杨朔、

秦牧、刘白羽、邓拓、吴伯箫、黄宗英、刘宾雁的散文特写，都有一些佳作。《茶馆》(老舍)、《关汉卿》(田汉)、《蔡文姬》(郭沫若)、《霓虹灯下的哨兵》(沈西蒙等)、《胆剑篇》(曹禺)等，是话剧方面的代表作。……上面列举的作品，能代表“十七年文学”所达到的水平。

但是，“十七年文学”的成绩，是有相当限度的。它存在着若干带根本性质的不足。首先，文学创作的题材还不很开阔。从小说和戏剧的创作情况看，取材往往集中在这样的几个方面：农村从解放初到六十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及其它中心工作；三、四十年代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工业建设上的生活矛盾等。工农业领域的表现，往往围绕开展的运动和中心工作，作品与每一时期的具体工作、政策过于靠近。这使许多作品都带有浓厚的阐释具体政治观念和政策思想的痕迹，使文学创作未能更广泛、深刻地反映社会变革，表现习俗、人情、心理的历史，未能更广泛、深刻地揭示、探索社会和人生的问题。其次，从“十七年”的创作情况看，确实缺乏深厚的、有较高思想艺术质量的力作，也缺乏能够成为一个时期文学成就标志的重要作家。现代文学时期的一些杰出作家虽然在建国后依然执笔，但是他们的“杰出”已留在历史上；而新成长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在开阔、深厚程度上，在对社会、人生的把握和体验上，在艺术的独创性上，都未曾出现可以与现代文学的杰出作家相提并论的人物。另外，在艺术风格、作家艺术个性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有比较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独创性的作家并非很多。而且，他们的艺术风格的发展，受到客观条件的极大限制，往往得不到充分发展。赵树理在建国以后所受到的束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家的创作个性、艺术风格的较充分发展，是文学创作繁荣局面出现的保证。而为了达到这一步，首先是作家

对生活、对社会有他独特的见解，有他的独特的体验，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美学追求。在一个作家追求思想创见十分困难的文学时期，要实现风格多样化，出现许多有独创性的艺术流派，是难以设想的。

第四、与政治的紧密关系。这个特点，也可以用来概括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与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但是，“十七年文学”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十七年中出现的多次的文艺运动，政策调整 and 理论论争，一再开展的文艺批判运动，其核心问题都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它涉及党和国家对文艺如何领导，涉及如何正确理解文学的社会功能、宣传教育作用，也涉及创作上题材、人物、艺术形式、艺术风格等一系列问题。在十七年中，虽然有些阶段，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片面、简单、狭隘的错误倾向常常占主导地位。领导对文学创作的简单、粗暴的干涉；题材上提出“赶任务”、“写中心”、“写十三年”的口号；把塑造英雄人物做为文艺创作的“根本任务”；在作品的风格、色调上，提出“主花”与“次花”，“提倡”与“允许”的概念；……所有这些措施、“理论”，无不产生于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错误理解。

十七年期间文学与政治的不正常的关系，更重要地表现为从建国初开始就接连不断开展的文艺思想斗争和批判运动上，可以说，十七年的文学发展过程，伴随着无休止的运动和斗争。这种情况，在中外文学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这些运动主要是：

1. 1951年5月开始的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孙瑜编导的电影《武训传》，在1950年上演后受到许多人的赞扬。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指出武训是在“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对反动的封建

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并批评《武训传》的赞扬者，指出“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社论发表后，掀起了全国性的批判运动。

2. 1954年，李希凡、蓝翎先后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等文章，批评俞平伯的观点。毛泽东在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认为，“这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并提出开展“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这一斗争从1954年10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3.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开始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初，这种批评得到继续，并于1955年发展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接着，与胡风等的矛盾，又迅速上升为敌我的性质，演变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株连了一大批拥护胡风文艺思想和与他有联系的作家。

4. 1957年6月开始的反右派斗争，文艺界是斗争的重点。贯彻“双百方针”所呈现的初步活跃局面被葬送，一大批作家、理论家成为“右派分子”。如丁玲、艾青、陈企霞、李又然、冯雪峰、罗烽、白朗、陈涌、公木、陈学昭、萧乾、傅雷、施蛰存、许杰、姚雪垠、徐懋庸、黄药眠、穆木天、吴祖光、秦兆阳、陈沂、吕剑、唐祈、王蒙、刘宾雁、公刘、邵燕祥、白桦、流沙河、胡昭、刘绍棠、陆文夫、邓友梅、方之、高晓声……

5. 1958年到1960年，对“资产阶级权威”的批判以及对修正主义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胡风、冯雪峰的理論又再一次被挞伐，并把巴人的《论人情》、李何林的《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等文章和一些作品（刘真的《英雄》、乐章》，方纪、海默的短篇小说，白刃的《战斗到明天》，徐怀

中的《无情的情人》等），树为宣扬“修正主义人性论”、“和平主义”的批判靶子。

6. 从1963年开始，涉及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规模巨大的批判运动。毛泽东在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对文艺问题作了两次批示，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在文艺界的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中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次批判运动，是即将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文艺方面，涉及戏曲《海瑞罢官》，《李慧娘》、《谢瑶环》，电影《北国江南》、《不夜城》、《早春二月》、《林家铺子》、《兵临城下》等作品，以及所谓“‘写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等理论问题。不过，在这次批判运动中，文学本身的问题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文学，已经成为政治斗争的名符其实的“工具”和“武器”了。

这些斗争和运动的性质、过程和问题，自然都还需要做细致的具体分析。有些运动的错误性质现在已十分清楚，已不需要做很多说明。对《武训传》、胡风的文艺思想的评价，对胡适、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功过的认识，这都属于可以展开讨论的问题之列。然而，把这些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提出，开展政治性质的批判斗争，却是完全错误的。因此，指出“十七年”中开展的这些频繁的斗争给文学事业带来巨大的危害，产生严重后果，是完全合乎事实的。

第二章 诗 歌 创 作

建国之初，诗歌创作同其他的文学样式一样，有一个摸索的阶段。因此，诗坛显得有些沉寂。“虽说也有一些写诗的人，然而却零零落落，很不整齐”（何其芳：《关于写诗和读诗》）。后来，这种状况逐渐有了改变。总起来说，从1949到1957年的这段时间里，诗歌创作的发展和成绩是明显的。其间，有两方面的情况值得注意。其一是，老一辈的、或已经在诗歌创作上走过一段路程的诗人，开始他们新的创作阶段。这些诗人，有的来自国统区，如郭沫若、臧克家、冯至、袁水拍、卞之琳、力扬、邹荻帆等，有的则来自解放区，如艾青、何其芳、田间、严辰、阮章竞、柯仲平、李季、张志民、蔡其矫等。他们的努力，有的取得较突出的成绩，但是，大多数人在“十七年”中的创作，并不理想，没有超过、甚至没有达到他们在解放前的创作水平。

原来生活在国统区的诗人中，有两部分人在五十年代前期遇到特殊的遭遇。一部分是在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事件中被错误处置而中断诗歌创作的“七月派”诗人，他们是胡风、阿垅、鲁藜、绿原、牛汉、冀沅、曾卓、罗洛、彭燕郊等。另一部分是活跃于四十年代、受西方现代诗风影响较大的诗人，即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他们由于艺术上的原因，在五十年代被迫先后辍笔。

这个时期的另一个情况是，一批人数众多的新诗人的出现。他们有的在解放前就写过诗，如郭小川、贺敬之、闻捷、蔡其矫等，但他们的主要成就是在建国以后，五十年代前期崛起的